

澳門和菲律賓群島之間的宗教聯繫

維拉羅爾*

如果不把深深影響澳門和菲律賓群島這兩個殖民地歷史的政治和經濟關係考慮在內，就不能充份理解兩地存在三個世紀之久的宗教聯繫。然而儘管澳門和馬尼拉地緣相近，卻分別代表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伊比利亞帝國的最遠地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探險家和傳教士從相反的方向出發終於繞過地球半圈之後在遠東相遇。

地理和政治背景

首先，這兩個殖民地之間的政治關係具有激烈敵對互不信任和區域政治競爭的特點，缺乏理解與合作，即使在基督教傳入並在各自領土上發展的時期也是如此。葡萄牙人對西班牙人在澳門附近出現一直心存芥蒂，這也不無理由。西班牙人根據當時的原始繪圖法，在不自知的情況下西行跨過太平洋，越過了亞歷山大五世教皇在 1492 年劃分的界限，竄入葡人的勢力範圍。這兩個殖民者在遠東（或者叫遠西）相遇，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地盤，就再也不肯放棄。1555 年葡萄牙人在南中國的澳門（Macau）立足，並在那裡建立了有豐厚利潤的商業中心。十年以後即 1565 年，西班牙人在宿務和整個麥哲倫群島立足。然而，直到兩個世紀以後的 1750 年，葡萄牙人才正式承認西班牙對菲律賓的擁有權。

宗教信仰是姐妹 其它方面是對手

令人奇怪的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成立聯合王國，統歸在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國王管轄期間的

六十年（1580-1640）之中，這兩個殖民地之間的政治關係並沒有緩和。西班牙和葡萄牙依然分治如舊，“一位君主，兩方管理”。事實上，這個聯合王國的特性之一就是兩個殖民帝國一直由兩個不同的皇家理事會分管，而這兩個理事會至今都是完全獨立的。葡萄牙人有聖職授予權，在宗教事務上行使重要權利，這種特權受到西班牙君主的尊重。

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引起菲律賓和澳門之間關係緊張互相猜忌甚至產生敵對情緒經常是源於貿易而不是政治。西葡兩國都試圖從受歐洲人青睞的東方產品的貿易中獲利。他們的傳教士不是隨征服者來到東方，而是隨商人一起滲入中國和日本。如果據查爾斯·博克塞（Charles Boxer）所說，葡萄牙人來到亞洲是為了傳教和販賣香料，那麼可以說，每年開往日本的葡萄牙船隻搭載的是基督徒、白銀和絲綢。至於每年來往於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船隻，從事的也是相同的東西方貿易產品。這裡必須說明，為了做好研究，我們祇有追隨這些船隻的航路，才能找出澳門和馬尼拉之間最為相關的宗教聯繫，尤其是在兩地淪為殖民地以後的前一百年間。

*維拉羅爾（Fidel Villarroel），多明我會成員，出生於西班牙的特赫里納（Tejerina）（萊昂）。他是馬尼拉聖·托馬斯大學檔案館館長和教會史教授，著有二十部著作，大部分是關於菲律賓、多明我會在遠東傳教和聖·托馬斯大學的歷史。他曾任馬尼拉羅馬教皇使節助理秘書長達三十二年（1959-1991）。他還是菲律賓研究院院士、西班牙皇家研究院通訊院士。本文是以其 1999 年 6 月在馬尼拉召開的菲律賓－澳門旅遊協會第一次會議上所提交論文的基礎上撰寫的。

澳門是在 1555 年建立的，而菲律賓宿務城的建立是在 1565 年。澳門被命名為“上帝聖名之城”，而聖·尼諾（Santo Niño）雕像在當地被西班牙殖民長官黎加什比（Adelantado Miguel Lopez de Legazpi）的人發現後，宿務就處於“耶穌聖名”的庇護之下。澳門比馬尼拉晚一年在 1580 年成為主教管區，馬尼拉是在 1579 年。十五年以後的 1595 年，馬尼拉被晉陞為大主教管區。但是兩個教會機構相互之間是完全獨立的。事實上，兩地都依附於處於對立狀態的相應的皇家保護人，雙方相互之間對教皇賦予對方的有關宗教事務的特權非常嫉妒。澳門是印度果阿的副主教教座管轄局，而馬尼拉開始時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墨西哥的副主教教座管轄區。因此，澳門和馬尼拉在宗教領域的聯繫不多，且在教區和各個級別的層面上的聯繫也不密切。

回到至關重要的商業關係上，澳門的葡萄牙人處於有利地位，他們與中國和日本之間進行大規模且利潤豐厚的貿易。實際上，他們宣稱是中國和日本這兩個競爭對手和敵人之間的獨家和事佬，葡萄牙人由於與中國共有邊界線，很容易與中國維持持續性的經貿往來。至於與日本之間，在 1555 年以後的近一百年間，澳門政府每年都向長崎港派遣船隊，7 月出發，11 月返航。在長崎逗留的三個月中，葡萄牙人用日本人喜歡的中國絲綢和其它商品換取從日本富礦開採出的中國人十分珍愛的白銀。與此項研究有重要關係的是，傳教士也隨船抵達日本。新生的日本基督教當時很需要這些傳教士，而在 17 世紀初開始的反天主教迫害中，這些人卻把自己描繪成商人。

對於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來說，為了與墨西哥、西班牙和歐洲的貿易，他們也需要深受歡迎的具有異國風格的中國和日本貨物，用阿卡普爾科帆船（Acapulco Galleon）載運。西班牙人與日本的貿易都是直接進行的，但從來沒有達到澳門的規模。而他們與中國的貿易，有些直接進行，有些則通過澳門去做。17 世紀，尤其是 1622 年，西班牙與日本商貿關係被日本軍界（Shogun）切斷

以後，葡萄牙船隻確實經常光顧馬尼拉。甚至在貿易被日本單方面切斷以後，西班牙傳教士還乘坐中國帆船秘密赴日。

澳門和菲律賓人聖·洛倫佐·雷茲 （Saint Lorenzo Ruiz）

馬尼拉－澳門－長崎三方商貿往來，為在日本發動的反基督教危機期間澳門與馬尼拉之間特別的宗教聯繫創造了條件。1614 年，日本德川家康將軍發佈的全面迫害法令震撼了整個天主教世界。歐洲的傳教士，不論是總部在澳門的耶穌會士還是總部在馬尼拉的托鉢修會修士，都被責令離開日本。那年 11 月，他們被趕上兩艘船遣返各自的城市。那些膽敢秘密留下的人則被搜捕，慘遭為自己的信仰殉難的厄運。儘管在傳教方式上見解不同，但在此期間，這兩個伊比利亞國家和其它幾個歐洲國家的傳教士們團結友愛並肩殉道，共同為自己的信仰慷慨犧牲。在日本這次長期進行的迫害中，成千上萬的基督徒以身殉道，他們中間有二百零五人在兩個世紀後的 1862 年被皮尤斯九世教皇（Pope Pious IX）封聖，1981 年和 1987 年又有十六人被若望·保祿二世教皇分別在馬尼拉和羅馬封聖。

對菲律賓人來說，這次迫害中最突出、最重要的殉道者是平信徒洛倫佐·雷茲（Lorenzo Ruiz），一位賓南杜人（Binondo）。但我們在研究中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澳門在我們瞭解他的殉道和受封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如果沒有澳門，我們幾乎不可能完成這個研究。洛倫佐 1636 年與一群多明我會修道士一起啟程赴日本，此行幾乎注定必死無疑。出發時洛倫佐並不確定此行的終點是哪裡，正如他後來所說，他原以為是去澳門，但是不論福兮禍兮，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確實也都是天意。此行的終點是日本，在沖繩秘密上岸不久，他們就被當局的偵探發現而被捕。一年以後，也就是 1637 年，他們被送往日本本土的長崎關押。在獄中他們受到殘酷的折磨，於 1637 年 9 月被判死刑，罪名就是他們的基督教信仰。

對這些殉教者也是一種幸運，就在1637年，從澳門派出的葡萄牙船隊在他們殉教時正在長崎灣停泊。這個船隊是葡萄牙殖民者組織的最大的船隊，“共裝載了942人，包括150名純葡萄牙人”。這些澳門商人從8月23日到11月6日一直在日本。就像前一年一樣，船員和商人被安排住在由日本政府多年前專門為他們建的房子裡，位於長崎濱水圍海造田的區域，沿着港口，面朝城市街道。1637年9月27日，這些澳門人透過窗戶看到了來自馬尼拉的一行五位基督徒，三位牧師，兩位平信徒，他們被馱在馬背上到離城牆不遠的一座山丘被處死，從這些商人的房子和船上都可以看到那座山丘。三位牧師是多明我會會士（一個西班牙人、一個法國人、一個日本人），兩位平信徒中一位是日本的麻瘋病人，另一位就是菲律賓的洛倫佐·雷茲。

一位澳門目擊者看到他們行進在敵對的人群中，後面的旗幟上寫着他們受刑原因。這位目擊者講述了他們排列的順序：“走在第二位的是混血兒洛倫佐·雷茲。他為了上帝勇敢地忍受着痛苦，慷慨赴死，為他的國家和那個賓南杜印地安村莊增了光。”許多葡萄牙人親眼目睹受害者被處以絞刑或砍頭的過程。

葡萄牙人見證這個場面具有特別的重要性。11月中旬當葡萄牙船隊返航進入澳門港時，一位碰巧路過澳門的菲律賓多明我會修士弗朗西斯科·皮涅洛（Fr. Francisco Pinelo）也加入了歡迎商隊歸來的人群。他從馬尼拉到西班牙途徑此地，聽到了商人們講述洛倫佐一行人以身殉道的故事。弗朗西斯科·皮涅洛立即趕往主教區法庭，要求在澳門主教區教會當局採取措施之前，先履行一道宗教程序，正式把證人的口頭證辭記錄在案，以備將來封聖之用。正式的調查實際上是在當年年底進行的，十九個葡萄牙人在澳門主教教區的宗教法庭上作證。

澳門船隊帶回來的還不祇這些，還有一篇記錄了這位菲律賓殉道者臨刑時感人情節的記述，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該文本出自於最可靠的目擊者之手：長崎法院的翻譯。文章是用葡文寫的，題目是：“上帝的殉道者，弗雷·麥古爾（Fray

Miguel）、弗雷·托馬斯（Fray Tomás）、弗雷·文森特（Fray Vicente）、多明我會教徒弗雷·安東尼奧（Fray Antonio）和馬尼拉人洛倫佐·雷茲。他們來自馬尼拉，1637年9月13日抵達長崎。”文中詳細敘述了洛倫佐·雷茲與他的日本法官之間的對話、在開始時瞬間的膽卻與疑慮和最後闡述自己的信仰準備為上帝獻身的英雄氣概。耶穌會士抄寫了這篇文章送往羅馬，原件被帶到馬尼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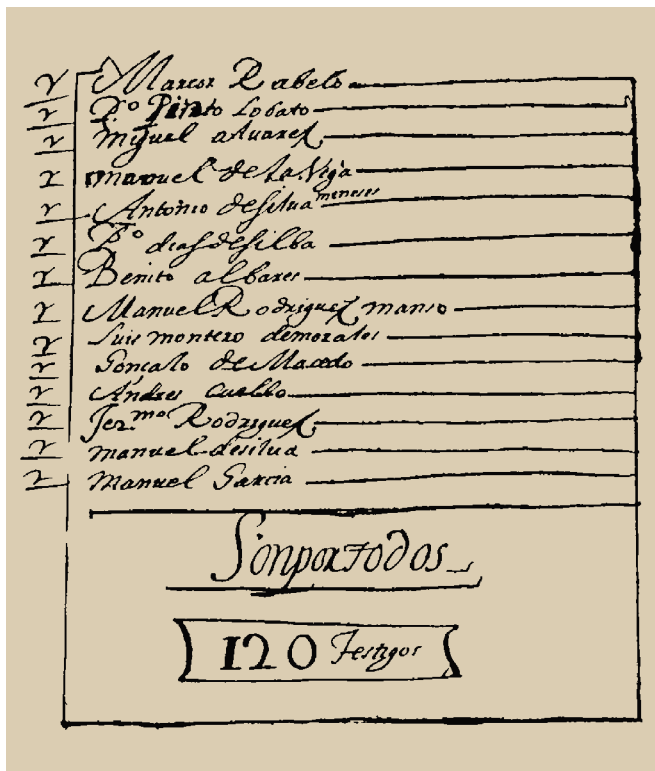
1637年12月27日，一艘澳門的小型貨船抵達馬尼拉，帶來了殉道者的消息，還有日本翻譯撰寫的記述文字。基督熱蕐捲馬尼拉。在因特雷姆羅斯（Intramuros）教堂的鐘聲中，馬尼拉人蜂擁而至，到聖·多明我（Santo Domingo）教堂和聖·伊格納西奧（San Ignacio）（一名耶穌會士神父在另一天也在日本被害）去唱感恩贊慶祝耶穌英雄的勝利。一位同時代的耶穌會士胡安·洛皮茲（Juan Lopez）是卡維特大學校長，他參加了這些慶祝活動。他寫道，這些葡萄牙的目擊者是乘小型快船來的，“他們在不停地講述這位聖潔的混血兒（洛倫佐）的勇氣、熱情和崇高精神”，講他受盡折磨，仍然一直進行佈道工作。

有關洛倫佐一行人的第二次宗教質詢，兩年後在澳門進行，這對馬尼拉和澳門兩地關係的加強起了進一步的推動作用。這次教會質詢的會議記錄被送到羅馬，後來丟失，所以我們不知有多少葡萄牙人出庭作證。我們所瞭解的是，聖托馬斯大學檔案館至今還保留一份1650年做的明細表，上邊登記了一百二十名準備為殉道者做有利證辭的澳門人。

三個世紀後的1981年，給這個驚人故事劃上了圓滿的句號。1981年，經過漫長的宗教程式，若望·保祿二世教皇來到馬尼拉封聖。2月18日，上百萬虔誠的菲律賓人懷着欽敬的心情聚集在魯涅塔（Luneta）公園，親眼目睹了教皇給洛倫佐和他的同伴們封聖。世界上成千上萬的電視觀眾通過電視目睹了這一盛況。就在教皇正式宣佈封聖之前，與教皇一起參加儀式的高級神職人員中的三位天主教主教站起來高唱〈請求教皇封聖〉。他們是馬尼拉的紅衣主教（Jaime Cardinal Sin）、代表長崎紅衣主教

Memoria De Antigos Portugueses que se hallaron en
 la ciudad de Angasaguay en el Reino de Xapori. A el martirio
 de los gloriosos martires el P.^o Fr. Antonio Goncalves y sus companias.
 P.^o Fr. Guillermo Courtet, P.^o Fr. Miguel de Oyarzun.

	Año De	1637	
Y Don fr. ^o de castel Blanco Cap. ⁿ maior	Y	Y	Nuno Casela. caponte.
Y Simon Vas. de Pauia fator.	Y	Y	Manuel de viga
Y Don fr. ^o de Repreira	Y	Y	Manuel de lamata
Y el leuand barza	Y	Y	Domingo mendel Mouraon
Y Gonçalo de silua	Y	Y	Antonio de silua. de menezes
Y Manuel fernandiz	Y	Y	fr. ^o Ruiz
Y Antonio lo bo de guerra	Y	Y	Antonio ferrera de silua
Y saluador Coello moison	Y	Y	Baltazar Prieto
Y miguel de Pauia	Y	Y	Gonçalo Ruiz
Y Anastacio Caldiza daluarenga	Y	Y	Ignacio Montexo de silua
Y fr. ^o Carniso de guerra	Y	Y	Ju. ^o Vazeto fator del Rey
Y Simon Nello barreto	Y	Y	Antonio ferrera de silua
Y Ju. ^o de Pauia de Repreira	Y	Y	Melchior de Vazari
Y Antonio de costa beniucho	Y	Y	Alexo de miquita Cap. ⁿ
Y Vasco Barbosa de melo	Y	Y	Antonio de silua fato
Y Ju. ^o de coello de macedo	Y	Y	Domingo Gonçalo de Repreira
Y fr. ^o Montero Omo	Y	Y	Domingo Caruuallo
Y Ruy dias de acobedo	Y	Y	P. ^o de Gallo
Y Gregorio de moran sarmiento	Y	Y	André Barbosa
Y Pascual Correa	Y	Y	Rodrigo Sanchez de Parade
Y fr. ^o Ferrera de silua	Y	Y	fr. ^o Gonçalo Prieto
Y Leonardo ferrera Marinho	Y	Y	Feliciano de Costa de mora
Y el mador Coello de melo	Y	Y	Christoual tauare. Carreira
Y Joseph de guerra	Y	Y	Antonio ferrera Caruuallo
Y Luis Montero de moran fr. ^o de silua	Y	Y	Benito marini
Y fr. ^o de acobedo Ferrera	Y	Y	Domingo Gonçalo de Repreira
Y bar. ^{me} de Rocha pimentel	Y	Y	Lorenzo Gonçalo
Y Luis de acobedo	Y	Y	Ju. ^o de Albari
Y Antonio Valente de Repreira	Y	Y	Manuel fernandes Alvaro
Y Luis ferrera	Y	Y	Manuel Peres
Y Matheo de Valladares	Y	Y	Ju. ^o de moura
Y Jer. ^{mo} Ruero	Y	Y	Ju. ^o de costa muiñoz
Y bar. ^{me} de Repreira	Y	Y	P. ^o Gonçalo
Y Manuel de silua	Y	Y	Baltazar de los Reyes
Y Antonio de mouro Verdade	Y	Y	Diego dias
Y Manael de feresqua Pinto	Y	Y	P. ^o dias de silua
Y Diego de mouro huxado	Y	Y	Andrés gome
Y Manuel de mouro de mouro	Y	Y	Manuel albariz. P. ^o
Y Gonçalo de mouro	Y	Y	Leonardo florez
Y Andre Coello	Y	Y	agustin de costa
Y Albariz mendi	Y	Y	Manuel aluarez
Y Miguel de Repreira Barbosa	Y	Y	P. ^o Ruiz Rios
Y Nicolas de bangar	Y	Y	Ju. ^o Ruero de lucena
Y Nicolas de costa	Y	Y	feanan Ruiz
Y Capax Camo	Y	Y	Ju. ^o de mouro Nello
Y Antonio de Rocha	Y	Y	Manuel fernandes
Y Ju. ^o de guerra	Y	Y	fr. ^o Ferrera
Y Manuel Ruiz mouro	Y	Y	Pascual Correa
Y Antonio de guerra neto	Y	Y	Ju. ^o Rodriguez Zarana
Y Manuel ferrera beltran	Y	Y	fr. ^o dias Foto
Y Jer. ^{mo} de costa lobo	Y	Y	Antonio de figueredo
Y Ju. ^o de mouro Nello	Y	Y	fr. ^o Vazeto



(續左頁) 準備為 1637 年 9 月被處決的洛倫佐·雷茲及其同伴作證的一百二十名澳門人名單

的京都大教主、澳門高斯塔主教 (Arquimínio Rodrigues da Costa)。這三個教區分別在某個時期內就殉道者的被害進行過宗教質詢。因此，三位請求者恰如其份地象徵着通過即平凡又特別的菲律賓人洛倫佐及其同伴的殉道，把馬尼拉、澳門和長崎這三個教區牧民的過去和當今在宗教方面聯繫起來了。

馬尼拉－澳門以及中國禮儀方面的論戰

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與在對待日本問題上相比，馬尼拉與澳門的關係要混亂得多，也緊張得多，甚而在神學領域和傳道方式上也是如此。其中主要是政治作祟。這兩個殖民地的傳教士要分別向他們的皇家保護人表示忠誠，也就是說要維護各自君主干涉宗教事務的權利，如在各自領地提供保護傳教工作的權利。葡萄牙人宣稱他們不僅在具有政

治管轄權的果阿、馬六甲、摩鹿加群島和澳門具有獨特的傳播福音的權利，而且也擁有向諸如整個印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中國和日本這些沒有管轄權的地方傳播福音的權利。此外，西班牙或者歐洲的傳教士不能到上述區域，除非沿着葡萄牙南部非洲的路線行進，或通過澳門進入中國，但他們必須要先發誓遵從葡萄牙保護者的權利。因此，那些試圖不遵守保護者權利而進入中國的馬尼拉傳教士，就會陷入與中國人和葡萄牙人的紛爭之中。

對於赴中國使團，更為雪上加霜的是，自從 1631 年，在傳教問題上，傳教士之間出現了嚴重的誤解和分歧，引起有關中國禮儀的不幸論戰，這場論戰持續了一個世紀之久。關於這場論戰不是我們研究的範圍。澳門的傳教士都是耶穌會士，簡單地說，自從 1583 年傳教士利瑪竇抵達中國後，耶穌會士一直允許新皈依者繼續使用某些中國傳統的儀式和禮儀，因為耶穌會士們認為這些禮儀符合文明規範。四十年後的 1631 年，馬尼拉的修道士們（多明我會和聖方濟會成員）抵達中國，他們強烈反對這種改良的傳教方式，指控那些中國禮儀是一種宗教信仰，是異教，與基督信仰背道而馳。雙方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沒有達成一致。至於中國人，朝廷和當地政府有時反對傳播基督教，因為它是外國宗教，他們甚至迫害傳教士和教徒，但他們對允許繼續使用中國禮儀的傳教士要寬大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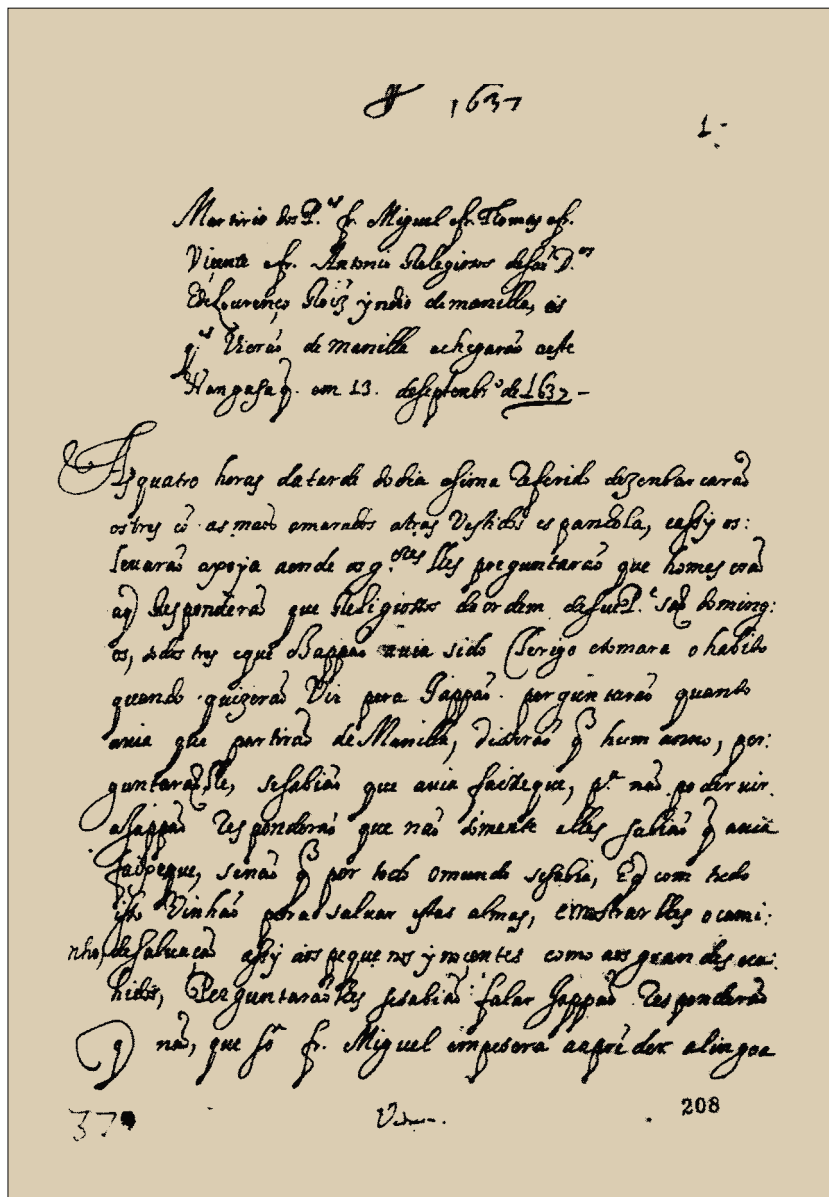
在繼而發生的神學爭論中，雙方都試圖贏得教皇的支持，但效果甚微，因為教皇開始時的決定是根據對立雙方對情況的不同陳述做出的。有時某次中國當局反基督教的迫害會導致把傳教士逐到澳門。有幾個著名的多明我會傳教士：胡安·鮑迪斯塔 (Juan Bautista Morales)、阿爾方索·納瓦雷特 (Alfonso Navarrete)、彼得·桑茲主教 (Bishop Pedro Sanz) (2000 年 10 月 1 日與一百一十九名其他在中國殉難的人一起被封聖) 等被流放到這個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在那裡他們得到聖多明我會修道院的慷慨相助，為他們提供食宿，但是從葡萄牙官員處甚至在高級神職人員那裡，他們卻沒有得到同情。

在1704-1710年羅馬教皇使節、大主教湯姆斯·梅拉德·托農（Archbishop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或譯“多羅”）造訪遠東期間，可悲的有關中國禮儀問題的衝突出現戲劇性的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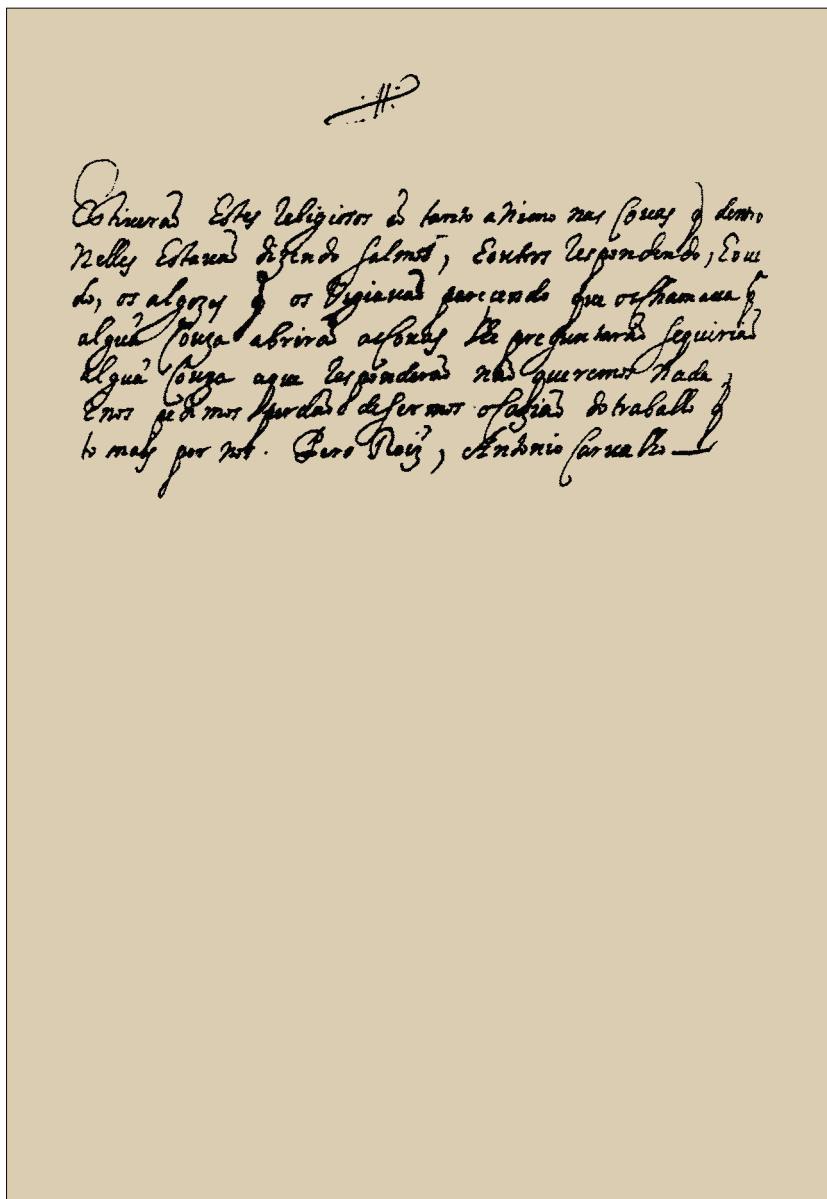
托農是克萊門特十一世教皇派去平息傳教士之間爭論的。但是在馬尼拉、中國和澳門歷盡艱辛之後，他的使命還是以失敗告終。他此行的第一站是途經馬尼拉，開始很不好，但不是最壞。從西班牙的卡迪茲（Cadiz）出發，身負教皇全權大使和使節的特權，托農沿着南非的葡萄牙航線向東航行。一次海難使他的船隻駛向了馬尼拉。由於沒有得到消息，他的到來使那裡的西班牙當局大吃一驚。此前這位使節沒有獲得西班牙皇家理事會允許在西班牙領地逗留的國書。在馬尼拉，沒有這個正式手續就意味着違反了皇家保護權，按現代外交的說法，應該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雖然他住在大主教宮，但殖民政府還是不客氣地通知他，叫他乘最近的一班船離開菲律賓去中國。

托農來到了澳門，這是該使節進入中國的合法途徑。他從澳門前往北京與康熙皇帝討論有關中國禮儀問題。托農在北京受到盛大歡迎，但很快便轉入厄運。朝廷熱情接待他，期望他能做出有利於中國基督徒繼續遵守中國禮儀的決定。但是，羅馬決定已出，使節托農很快就宣佈了羅馬教皇對中國基督徒沿用中國禮儀表示強

烈譴責的法令。康熙皇帝既失望又憤怒，他下令把這位使節從中國領土驅逐出去。托農被人送到廣州，最後到達澳門。菲律賓修會的傳教士也隨後被驅逐，因為他們一直同情這位使節，也支持羅馬教皇的法令。為此，這些多明我會、聖方濟會和奧古斯丁教團的傳教士們被放逐到澳門。但那裡等待他們的，與其說是同情，不如說是敵意，這是他們所始料不及的。



由長崎法庭翻譯佩德羅·羅德里格斯（Pedro Rodrigues）和安東尼奧·卡瓦羅（António Carvalho）所寫記述文的首頁



由長崎法庭翻譯佩德羅·羅德里格斯（Pedro Rodrigues）和安東尼奧·卡瓦羅（António Carvalho）所寫記述文的最後一頁

1707年後的三年中，使節托農一直被澳門當局單獨囚禁，受輕視甚至被虐待，他唯一的慰藉就是得到同被流放的菲律賓傳教士和一些澳門基督徒精神上的支持。多明我會修道士在他們葡萄牙同胞的聖·多明我修道院裡受到兄弟般的接待，但是即使在這個世外桃源，他們也沒能逃脫政治迫害。他們的修道院遭到政府情報人員的攻

擊，葡萄牙修道院長被流放到果阿。就在政府這些動作此消彼長的時候，澳門傳出羅馬教皇的使節、大主教托農被克萊門特十一世教皇提陞為紅衣主教的消息。傳聞變成了事實，六個月後，從馬尼拉來的船隻抵達這個葡萄牙殖民地，給這個被囚的高級教士帶來了紅帽子和作為紅衣主教的徽章。但是不論托農從教皇善意致謝的姿態中得到了多大安慰，欣喜是短暫的。同年，也就是1710年6月6日，托農紅衣主教在澳門去世，據說是死於由精神折磨、虐待和傷心引起的腹部疾病和中風。

與此同時，那一年被流放的多明我會修道士抵達馬尼拉，受到同胞的熱情歡迎。他們被奉為中國傳教領域的前輩楷模。與日本殉道者的情況不同，這一次菲律賓和澳門的宗教聯繫在嫉妒和誤解中終結，對兩個殖民地一直支持和促進的傳教使命造成了不可修復的傷害。

一個菲律賓主教在澳門的墳墓

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有充份理由指責他們的葡萄牙鄰居把保護國的權利運用到了極點。但是我們也要說，在對待菲律賓教會事務中西班牙皇家保護者權利的問題上，西班牙人也同樣毫不妥協。托馬斯·巴迪亞一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奇怪的是，它發

生在 19 世紀中葉啟蒙主義、自由主義和反對教權主義滲透國家及殖民地各級政府的時刻。那時候教會不再是國家官員們的關注點，他們對宗教的態度變得漠然甚至有些敵對，當然除非教會的神父、傳教士和教區牧師在對於保持菲律賓人對西班牙的忠心問題上能夠起作用。

在呂宋北部做了幾年傳教士以後，多明我會修道士湯姆斯·巴迪亞 1833 年被上司派往中國福建傳教。他被歷史學家希拉里奧·奧西歐（Fr. Hilario Ocio）描述為一個率真、坦誠、謙虛並敬畏上帝的修道士。應最受尊敬而年長多病的馬尼拉大主教約瑟·賽古的要求，巴迪亞修道士被羅馬教皇晉陞到主教高位。1842 年在途經澳門去新加坡接受教皇詔書的時候，他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被視為主教。雖然表面上他被任命為福建主教的助手，詔書的真正目的是使他成為馬尼拉大主教的助手。但是羅馬教皇的意願是一回事，最後的實施卻是另一回事，因為雖然所有教會要求都被滿足，但是這個任命仍有法律缺陷。在某種程度上，教皇使用了新加坡的後門給馬尼拉大主教提供接班人。

當巴迪亞閣下幾個月後前往馬尼拉時，他發現自己被捲入政治風波。他的提名沒有皇家的推薦，違反了印度保護者（*Patronato de las Indias*）的權利。大度的殖民政府對他以外僑相待，命令他乘最早的航班離開菲律賓去中國。與此同時，殖民當局遣人去馬德里匯報請示。巴迪亞閣下離開菲律賓駛往澳門，又從澳門到達福建。到福建不久由於疾病纏身又返回澳門就醫。但是他的健康狀況不是他返回這個葡萄牙殖民地的唯一理由，當地教會要求他當主教，澳門主教座上又任命了新主教：尼古拉斯·費雷拉（Nicolas Rodrigues Ferreira），讓巴迪亞給他當副主教，巴迪亞答應了。與此同時，有消息說，西班牙伊莎貝拉二世女皇批准了巴迪亞作為馬尼拉大主教助手，為他赴任掃清了障礙。但是一切已太晚了，這位疾病纏身飽受煩擾的高級教士未能到菲律賓赴任，1844 年 9 月 1 日於澳門逝世。

這次，葡萄牙人對巴迪亞的後事處理作出了慷慨的姿態。應弗雷拉主教的要求，總督允許已故的教士得到高規格的葬禮，並親自出席了葬禮，澳門市政議員、法籍羅馬教皇駐中國代表和所有在澳門的傳教士以及大批信眾都參加了葬禮。他的遺體被安葬在多明我會的聖玫瑰堂墓地，這是澳門最主要的教堂。他的墓至今可見，供旅遊者和朝聖者參觀。在內殿主祭壇前的墓碑上，用拉丁文刻着這塊墓誌銘：

THOMA BADIA
HISPANE. EX PRAEDICATORUM
ORDINE
OPTIME. MERITE. VIR.
PAX TECUM
TIBI. EPISCOPO. YSAURAPOLITANO
ATQUE. PHILIPPINARUM. ARCHIEP.
COADJV-TORI
QUI MACAI. OBIISTI
HEV.
KAL. SEPT. A.D.MDCCCXLIV
ANNOS. NATVS. XXXVII
HUNC. LAPIDEM
NICOLAUS. MACAONENSIS.
EPISCOPUS.
LUGENS. POSVIT.

【譯文】托馬斯·巴迪亞／西班牙人傳教士／善良，品格高尚／安息吧／生前為艾索羅伯利斯（Isauropolis）主教，菲律賓大主教助手／1844 年 9 月 1 日在澳門逝世，享年三十七歲／立碑人：悲痛的澳門尼古拉斯主教。

澳門－馬尼拉和印尼 天主教殉教者與一場戰爭

18 世紀和 19 世紀初，從菲律賓到亞洲大陸傳教的祇有多明我會傳教士，他們的傳教地區是中國和越南。1640 年以來，日本對西方一直緊閉大門。對

臺灣的傳教在1642年關閉後，直到1859年才重新開放。菲律賓多明我會曾在亞洲大陸擁有眾多傳教士，他們在澳門設立了辦事中心。

經過17世紀的抗爭，葡萄牙殖民當局終於不情願地同意菲律賓多明我會曾在澳門建立一個辦事處。辦事處1759年在聖玫瑰堂後邊的一座建築中開始辦公。辦事處一直延續到1861年，後來遷往新建立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菲律賓多明我會曾在澳門存在的一百零二年裡，澳門與菲律賓的宗教交往頻繁。辦事處代理整天忙於為往來於馬尼拉的傳教士安排食宿。他要親自料理中國和越南傳教團的物質援助，把來自歐洲或菲律賓的資金分發下去，與傳教士們保持經常的通信聯繫。他的辦事處就如同傳教士與他們在馬尼拉的上司之間、馬德里和羅馬之間的郵局，一直在傳遞有關中國和越南傳教工作的進展情況。澳門辦事處的繁忙程度可以從現存於羅沙里多明我省檔案館中有關這些使團的文件反映出來，此省原名菲律賓省。

先不說該辦事處的各種工作和服務，我們祇研究它19世紀中葉在涉及西班牙、法國、菲律賓和越南的國際衝突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指的是1858年法國—西班牙人對越南的軍事征討，行動以整個印度支那半島統歸於法蘭西帝國麾下而告終。這件事值得一提，因為所有有關東南亞的歷史書籍都沒有提及此事。

1857年8月的一天，兩個越南天主教信使抵達澳門多明我會辦事處，帶來一摺傳教士的信件。辦事處負責人弗朗西斯科·羅伊瀏覽完這些信件以後，陷入深深的沮喪和驚恐之中。安南（即今越南）皇帝土杜克（Tu-Duc）剛剛宣佈開始針對天主教進行可怕的迫害。前一段時間，土杜克的祖父明曼就在越南宣佈過其它反基督教法令。土杜克的法令更嚴厲更具破壞性。事實上這次迫害使成千上萬基督教殉道者血流成河，他們中很多人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在不同場合被封聖，約翰保羅二世在1988年將所有的越南殉道者列入封聖名單中。

當時，最令辦事處代理羅伊吃驚的消息是安南當局逮捕囚禁了中心使團的名譽主教、西班牙多明我會的約瑟·聖哲尤（José Ma. Díaz Sanjurjo）蒙席，他曾任聖·托馬斯大學的人文科學教授。羅伊十分震驚、困惑和無助，他迅速把這個消息告訴在澳門的西班牙領事卡內特·伊·莫拉爾（Don Nicasio Cañete y Moral），看他能否為營救主教保障基督徒的安全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而走上安南的法庭。卡內特在澳門沒有可支配的船隻，無法接近安南的海岸去與朝廷和傳教士取得聯繫，馬尼拉又太遠，無法立即採取行動，所以領事決定與法國駐中國的全權公使阿爾封斯·布爾布龍（Alphonse Bourboulon）取得聯繫，因為他在南中國海有一支可以調度的法國艦隊。除此之外，法國也對安南朝廷有所不滿，認為他們在最近幾年對那裡的法國公民有虐待之嫌。

營救活動在遠東和歐洲緊鑼密鼓地展開。卡內特和布爾布龍兩位外交官從多明我會辦事處現有的信件中進一步瞭解了安南現狀。他們決定把一艘法國戰艦派往印度支那沿海，就安南朝廷過去對法國和西班牙公民違反人權的做法，特別是就釋放主教聖哲尤和基督徒的問題向他們討回個說法。然而對於主教來說，外交行動來的太晚了。當戰艦抵達安南海岸時，他們得知聖哲尤主教已經在兩個月前被判死刑，於同年的7月20日在南定（Nam-Dinh）被斬首，其後又有不少人被處決。有關資訊被送往馬德里和巴黎，結果經過反覆的外交協商，為制止安南對兩國公民違反人權的行徑，西班牙和法國兩國政府決定對安南進行軍事干預。

據歷史記載，一支海軍部隊被派往越南，佔領了幾個港口，迫使土杜克皇帝接受歐洲人的要求。法國在南中國海備有一支強有力的艦隊，西班牙從菲律賓有限的駐軍中派出了一個小分隊。就菲律賓人參加這次行動的情況來說，除了西班牙部隊中的士兵外，法國艦隊還僱傭了九百名菲律賓人。四年以後，戰爭以入侵者的勝利而告結束。法國吞併了整個印度支那半島（安南、交趾支那、老撾和柬埔寨），而西班牙帝國當時已經明顯衰落，被盟國排



聖·玫瑰堂正面圖（紙本鉛筆畫）錢納利 1839 作

斥在分享戰利品的範圍之外，沒有在越南得到一寸可立足之地。

上述祇想表明一個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這件牽涉到東南亞將來的重要事件，是源於在澳門的菲律賓多明我會辦事處接到的來自越南的信件。

澳門聖母像和來自馬尼拉的 “貧寒者克萊爾”（Poor Clares）修女

為給本研究一個恰如其分的結尾，我們要簡略地談一談涉及澳門和馬尼拉的兩個宗教事件，一個與對聖母瑪利亞的崇拜有關，另一個與馬尼拉一群“貧寒者克萊爾”修女有關。

著名的多明我會歷史學家戴戈·阿杜亞特修士（Fr. Diego Aduarte）1640年以前寫了有關早期菲律賓傳教士的著名歷史書籍。他告訴我們，現在座落於圖蓋加拉奧（Tuguegarao）省的正在被市

民參拜的皮亞特（Piat）聖母瑪利亞雕像，是由一些不知名的藝術家在澳門雕刻的。這尊雕像約在17世紀初被運往菲律賓，先是被安放在卡加延山谷（Cagayan Valley）的拉羅城（Lallo）（原稱為新塞哥維亞 Nueva Segovia），後來被轉到皮亞特市。那些把塑像從澳門運來的多明我會修士決定用一座更漂亮的雕像代替它，把原來澳門這座轉移到圖蓋加拉奧，但是新近皈依的伊巴納格斯人（Ibanags）已經對這座澳門雕像有了深厚感情，強烈要求把它運回皮亞特。他們的願望得到了滿足，從此這座皮亞特聖母像一直是卡加延山谷所有人崇拜的對象。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633年至19世紀中葉在澳門的“貧寒者克萊爾”（Poor Clares）修道院。該修道院的建立歸功於建馬尼拉修道院的同一批修女，馬尼拉的這座修道院至今依然存在。現在的馬尼拉聖·克拉拉修道院1623年由耶羅尼馬·阿遜西昂修女（Jerónima de la Asunción）和一群來自西班牙托萊多的修女建立，她們到馬尼拉是為了建立自己的修道會。現今為耶羅尼馬修女封聖的最後一道程式正在羅馬教廷中進行。1624年，就在因特拉姆羅斯（Intramuros）建立修道院一年以後，澳門的一些葡萄牙人來到馬尼拉，堅持請耶羅尼馬修女派一些修女去澳門修建一座修道院。聖潔的女創建人希望滿足這些澳門人的請求，但是遇到了一些難題。1630年耶羅尼馬修女去世。

最終，1633年，因特拉姆羅斯修道院的六位修女在修道院長里昂諾·聖弗朗西斯科修女的帶領下抵達澳門，按計劃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滿足了信眾的要求，在宗教界盛極一時。但是在初期並非一切都那麼順利。十一年以後的1644年，令修道院特別不高興的是，參與創建修道院的三位修女被葡萄牙當局驅逐出澳門。這些修女途經交趾支那返回菲律賓的修道院，於1645年5月20日抵達馬尼拉。新生的澳門修道院經受住了這次考驗，澳門聖·克萊爾修道院蓬勃發展，直到葡萄牙19世紀頒佈取消修道院的法令。

尚春雁譯